

● 辽宁社会科学党史系列

● 辽宁省东北抗日联军史暨抗战史研究会 1994 年会优秀论文选

东北抗日斗争 论文集

辽宁社会科学党史系列

辽宁省东北抗日联军史暨

抗战史研究会 1994 年会优秀论文选

东北抗日斗争论文集

1995 · 沈阳

辽出临图字 [1995] 第 63 号

责任编辑：张洪君

责任校对：李德绰

封面设计：李国盛

版 式：刘英杰

东北抗日斗争论文集

主编 高树桥

辽大彩色图文印刷中心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20 千 印数：1—400 册

定价：5.0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沈显惠

副主任委员 温永禄 罗占元 谭译 高树桥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连捷 马尚斌 刘品荣 刘英杰

李勤 李秉刚 闫中仕 张庆斌

张志坤 张洪君 周平生 赵俊清

唐庆雄 高树桥 赫中洽 廖晓晴

穆忠德

主 编 高树桥

副主编 唐庆雄 张洪君 李秉刚

审 稿 王 驹 卞直甫

目 录

关于抗联一军一师西征的几个问题	丁国勋 (1)
从抗联西征的战略企图看党对东北抗战领导的偏颇	刘品荣 (7)
抗联一军一师首次西征会议时地考略	范金生 (13)
也谈抗联一军一师两次西征的动因	初 卓 (17)
东北抗联后期斗争评价新探	王振洁 管延辉 赵宏伟 (23)
略论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作用	沈济文 (30)
试论东北抗日联军的思想政治工作	赵俊清 (34)
进入远东地区野营整训是东北抗联的最佳选择	高树桥 (39)
论桓兴“老秃顶”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兴衰	刘 畅 (47)
试论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及丧失的历史原因	穆忠德 穆红月 (53)
试论桓仁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特点及影	李秀廉 (58)
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李 勤 (64)
试论东北抗战的历史作用	李秉刚 (70)
试论东北抗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and 作用	王宝来 (77)
试论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	单世文 (82)
浅议本溪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特点	王素清 (89)
关于“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问题	张洪君 (93)
为张学良的“不抵抗”辨诬	周平生 (100)

流亡关内东北各界人士呼蒋释张活动述略	王 驹 (106)
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主义	卞直甫 (113)
辽南义勇军在营口	马慧富 (119)
辽南抗日义勇军在抗战中克敌制胜的几个战术问题	马尚武 杨宝侠 张恩仲 (125)
中共满洲省委与东北义勇军	艾 萌 (131)
中共满洲省委紧急会议有关情况辩误	安振泰 (137)
辽东抗日斗争活动对早期中共本溪地方组织建立的影响	闫中仕 (140)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问题	罗占元 郭化光 (145)
“八年抗战说”新解.....	廖晓晴 (152)
浅谈“九·一八”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起点 ...	白 水 (157)
从《少年铁血团入团须知》看苗可秀的国家,民族思想	朱秀兰 (160)
苗可秀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立我见	吴宝春 齐放 (166)
抗日英雄“老梯子”	王云鹏 高宝顺 (171)
吴大澄评价问题浅议	张志坤 (177)
辽东三角地带抗日斗争几个史实记述问题之我见	房月生 (185)
浅析辽东三角地区人民武装抗日斗争受挫的主要原因	贾崇智 (191)
谈凤城地区民众抗日武装的几个特点	吴宝春 (197)
辽东抗日救国会惨案述略	穆忠德 袁会久 (203)

庄河抗日斗争发展概况及特点	顾春发 (209)
阜新煤矿工人反日斗争的特点	赫中洽 (215)
简析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	聂志强 (221)
韩国独立运动将领生宽甸的反日复国活动	尚振生 (228)
甲午战争中旅大军民抗日述略	徐建东 (234)
中日甲午战争辽阳保卫战胜利原因初探	易 龙 (241)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与思考	张庆斌 (246)
东边道朝鲜抗日史略	李 戎 (251)
浅谈“北方会议”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消极影响	金国范 (257)
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王连捷 (260)

关于抗联一军一师西征的几个问题

丁国勋

西征的行军路线

抗联1师西征是从本溪出发，向辽西、热河一带挺进。这中间要穿越几百公里的日伪统治区。西征的行军路线是怎样确定的呢？有的著述中称：为“避开日寇军事实力雄厚的沈阳、鞍山一线，从辽阳、岫岩、营口等地迂回西进，跨过辽河，直插山海关或热河……”^①把岫岩纳入了西征选定的路线之内，这是不确切的。

抗联1师西征部队（以下简称西征部队）于1936年6月28日，自本溪上石棚附近出发，经沙窝沟、大东沟、直抵草河口，7月1日跨越安奉铁路，到达朝天坝，向西挺进。由于被日军发现受到追击，转道进入凤城境内的小长岭，西行进入岫岩北部山区的坟茔沟（今属石庙子镇石棉村），而后向西北方向进发，越赵家岭进至辽阳界内的翁家堡子。在这里窃听敌人的电话得知，敌军正向这里扑来，遂向南折进，又进入岫岩境内，到达姚家街和生铁沟（均属今三家子镇许家村）。

从上述一段的行军路线可以看出，抗联1师计划的西征路线是，跨过安奉铁路直插辽阳境内，沿山路西进，在海城一带越南

^① 引自《浑太两岸的抗日烽火》第37页。

满铁路，过辽河、直奔辽西、热河地区。岫岩不在原定的西征路线之内，只是由于遭到日伪军的追阻，才被迫转入岫岩境内，迂回西进。抗联1师参谋长、西征部队领导人李敏焕在他的日记^①中所记录的当时情形，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李敏焕在日记中记载，7月1日“越过安奉铁路，到达朝天坝”。7月2日“早6点左右，刚刚做好了饭，就受到敌人的袭击，部队立即退向昆岭的最高点，……午后1点左右，据哨兵报告，陈家堡子有敌情”。7月3日凌晨1点集合，“继续行军，准备在大树沟吃午饭，结果由于2排哨兵发现了敌人，便立即集合……交战以后，……我队则集合越过长岭，到小长岭附近宿营。”7月4日进入岫岩境内，“在矿洞沟吃过午饭后”，晚间“到坟茔沟宿营”。7月5日奔向西北方向，经赵家岭重入辽阳界内，“在小蛮子峪、翁家堡子吃饭”，因“从电话里得到敌人情报”，部队便转道向南，越过榛子岭再入岫岩境内，“到达生铁沟、姚家街宿营”。

西征部队于7月4日折进岫岩境内，是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堵，并没有放弃原定途经辽阳的行军路线，所以次日又返进辽阳境内，7月5日，第二次进入岫岩后，则决定放弃原定的一段西进路线，取道岫岩迂回再进。

西征部队在岫岩境内，自生铁沟、姚家街分两路向西南方向前进，在陆家堡子（今属牧牛乡大木古峪村）后岗会合后，击退追击的日军，进至大映沟、狸狐沟（均属大房身乡太阳村）。少年营由此西进抵弟兄山（今属偏岭镇三间房村，由此再西进即进入海城、营口界内）一带，与追堵的日伪军激战后，少年营1连沿山路南进，抵靠近营口县境的瓦沟、夹皮沟（今属哈达碑镇瓦沟村、头道沟村）。在这里同日军交战后，摆脱了敌军，向南进至龙潭沟（今龙潭乡梨酒沟村一带），西征部队领导人率保卫连和3团

^① 见《李敏焕日记片断》（原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东北抗日战争史论丛》）

在狸狐沟、道岔沟、龙眼沟 10 公里方圆内辗转隐蔽 3 天，使日军搜索扑空，飞机侦察也没发现目标，这一段的行军路线表明，西征部队经岫岩欲取道海城（南部山区）或营口，迂回西进，因受到日军的疯狂追阻，被迫停止西进，分路回师。

西征的战略意图

抗联 1 军为什么在 1936 年 6 月派部队西征，即西征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有的说：派 1 师“向辽西、热河一带远征，以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的联系”；^①有的说，是“为了进一步向辽西伸展，配合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的联系”；^②还有的说：为了“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好形势，配合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抗日武装力量的直接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孤立作战的局面，并努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③等等。尽管说法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的直接联系，这是值得商榷的。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中共满洲省委便与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党中央到达陕北，并组织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抗日，这对抗联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这种情况下，抗联对尽快打通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直接联系的愿望更加强烈，是必然的。但抗联 1 军在当时所处的形势下，不会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决定西征，如果主要目的是为了打通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直接联系，可以采取其他方法，如派负责人奔赴陕北，还可以派秘密交通去关内寻访或直奔陕北。这样，则比派出大部队穿越日伪严密统治的敌占区进行远征，一般会安全、简捷、迅速

①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 301 页，另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429 页。

②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246 页。

③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140 页。

得多。反之，派出全副武装的大部队执行这一任务，不仅会付出很大牺牲，还会受阻而不能达到目的。对此，南满省委和抗联领导人是绝不会疏忽的，也绝不会轻率地凭借敌伪报纸登载的一则消息，而贸然派兵西征。

决策西征的主要领导人，抗联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在他亲自谱写的《西征胜利歌》中，把1师西征的战略意图用歌词作了明白的表述：“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周保中在《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和东北抗日联军》一文中，对西征是这样记述的：“1936年夏，我延边游击区的第2军，在日寇军事进攻下不得不脱离延边。第5军主力则向北转移，第1军向辽西发展的计划屡屡受阻碍，东南满经营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无法实现”。这都清楚地说明，1师西征，是为了向外线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而不是以打通与党中央或中央红军的直接联系为目的。西征部队少年营第1连长张泉山在回忆中也说，西征“并没有与关里接头的任务”。^①

西征，是抗联第1军根据当时南满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做出的战略决策，1936年，是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第6个年头，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奋战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大量兵力。日本侵略军为了尽快消灭以抗联为主体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使东北变成它侵吞中国的战略基地，于1935年制定了以抗联为主要目标，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治安肃正三年计划”。1936年上半年，日本关东军在不断组织日伪军进行“讨伐”的同时，又紧锣密鼓地加紧准备在下半年实施第二期“治安肃正纲要”。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打通与党中央或中央红军的联系固然重要，但迫在眉睫的是，如何粉碎日军的疯狂“讨伐”，在

^① 参见《浑太两岸的抗日烽火》第105页。

反“讨伐”中保存、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抗联1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作出派一师西征的决定，其战略意图显然是：向外线发展，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以分散、牵制敌军的兵力，更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军。

西征失利的原因

1936年7月8日，西征部队进至岫岩县大房身乡太阳村的道岔沟。西征部队的领导人在这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停止西进，分路回师。西征虽然中途折返，但西征行动的本身扩大了抗联活动地域，插入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区，打击了追击堵截的日伪军，使日本侵略者惊慌失措，生活在铁蹄下的人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从而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1师西征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重要收获，在军事上也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西征出发时400多人，回返到抗联营地仅有100多人，少年营1连出发时70多人，从弟兄山到龙潭沟，返回到北交界牌附近，共打了6次大仗，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只剩下连长和2名战士，宁死不屈，毅然跳崖。1师参谋长李敏焕率队回返经过摩天岭时，在同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抗联1师西征失利的原因是什么？

（一）敌军疯狂追堵，西进受阻。西征部队为了通过敌占区，隐蔽行军，穿行于远离公路的高山密林中，昼宿山野深夜行军。尽管如此，在跨越安奉铁路时还是被日军察觉，越过铁路之后，即受到日伪军的追击。当日军确认这支部队不是地方的义勇军，而是一支执行重要任务的抗日联军之后，立即调集部队尾追堵截。奉天（沈阳）、辽阳、海城等地日伪军奉命出动，甚至派飞机配合侦察，对西征部队形成了较大范围的包围。西征部队虽然给追堵的日伪军以狠狠地打击，但是，在远离游击根据地的日伪统治区，无

法改变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每前进一步都受到日伪军的堵截，每到一地敌军都跟踪而至。这是西征失利的主要原因。

（二）没有取得沿途各地义勇军的配合与支持。到1936年岫岩、辽阳、海城一带的抗日义勇军，在邓铁梅、苗可秀等义勇军领导人为国捐躯之后，其余部仍坚持在这一地区同侵华日军进行顽强地战斗，在岫岩境内由白承润为总司令的少年铁血军，1936年六七月间仍有数千义勇军，分别由白承润、阎生堂、赵庆吉、曹国土率领转战在辽南“三角地区”。如果抗联在决定1师西征的同时，派出交通去沿途各地联络义勇军，必将得到义勇军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情况可能会好一些。然而，西征部队在进入岫岩屡遭日伪军追击堵截之后，才向群众了解当地义勇军的情况，少年营1连自弟兄山南进时，营长才向1连交待寻找邓铁梅部义勇军，而为时已晚。这是1师西征失利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三）决策失慎。在当时的形势下，抗联1军决定派部队西征的战略意图是积极的，应该肯定的。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致使决策失误。西征部队要抵达辽西、热河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需穿越辽阳、海城、营口、锦州等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区，跨越安奉（沈阳至丹东）、南满（沈阳至大连）、奉山（沈阳至山海关）三条有敌军重兵守护的铁路线和辽河。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400多人全副武装的抗联部队，尽管行军路线避开了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但要通过布有重兵、严密统治的千里敌占区到达西征目的地，是难以实现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相脱离，导致决策失误，是1师西征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联1师虽然失利，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仍不失为一大壮举。在西征部队当年路过的地方，人们还在讲述当年抗联打日本、爱护老百姓的故事。

（作者单位：中共岫岩满族自治县委党史办）

从抗联西征的战略企图 看党对东北抗战领导的偏颇

刘品荣

1936年，东北抗联第1军进行了两次西征。两次西征作为抗联1军的战略行动，虽然都失利了，但它的积极意义是肯定的，不失为东北抗联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在这方面，不少专家作了充分的论述，但对抗联1军两次西征的战略企图的论述，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把它展开来，也没有把它与党（特别是党中央）对东北抗战的领导相对照，总结出经验与教训来。

抗联两次西征的战略企图

1937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前后共编成11个军，3万多人。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之下，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再次呈现高潮。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制定了1936年到1939年的所谓“军事讨伐与治安肃正”计划。1936年日本关东军从1931年10400人，增至10万余人，仅参加1936年度第三期“讨伐”的关东军主力部队就达8万余人。^①可见，日本关东军为迅速消灭抗日联军，进而为大举进关侵略中国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围剿下了力量。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第1军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面对强大敌人包围的情势下，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坚持到外线作战，扩大抗联的活动区域，把游击区域向辽西直至关

①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868页

内发展。这是西征的第一个战略企图。

抗日联军的两次西征的第二个战略企图是急需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在日寇的军事占领和封锁下，东北党组织特别是抗日联军与关内党中央的联系时断时续，有时只能得到苏联共产国际方面的某些指示。至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共产国际已无法向东北党组织转达中共中央的消息和指示。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联军孤悬敌后，急需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抗联西征的第三个战略企图是打通东北与华北通道，得到中央红军东征部队的支援，使东北、华北的抗日武装联成一片。

杨靖宇从报纸上看到红军长征胜利后，在热河一带有中央红军的部分军队在活动，（实际上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东征战役，时间是1936年2月—5月。）于是就产生了西征的战略企图。杨靖宇下定决心要进行西征，并作了周密的部署。第一次西征由抗联1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率队出征，其它领导有1师师长程斌（后叛变）、参谋长李敏焕，全部西征部队300余人。第一次西征失利后，杨靖宇又决心进行第二次西征。根据1师失利的教训，由3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400轻骑拟利用入冬辽河封冻之机，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乘敌不备越过辽河，直插热河，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接上关系。第二次西征于1936年11月下旬开始，抵达铁岭县石佛寺辽河东岸。因河水未封冻受阻，再加上敌人疯狂堵截而未果。

杨靖宇身为东北抗联1军的总指挥，从东北的实际出发，深知抗联的处境，渴望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军事上的指挥，并以西征作为抗联1军的重大战略行动，这说明西征战略行动是英明的，同时也说明杨靖宇的战略思想是有先见而又深谋远虑的。

党中央对东北抗战领导的偏颇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初期，由于抗日联军处于东北一隅，同党中央联系极为困难，孤军奋战于日本法西斯残酷统治下的沦陷区，难于得到党中央正确的、及时的指导。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部分合理性。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强调客观的东西多些，强调主观的东西少些，更缺乏战略家的宏观。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党（特别是党中央）对东北抗战初期领导问题上出现的偏颇。

（一）一般号召多，具体部署少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央多次发表抗日宣言，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1938年11月5日）等。

这些宣言、指示信中，一般号召、标语口号居多，而针对东北抗战的具体部署少，从总体战略上考虑的也少，其中“一二六指示信”是针对东北讲的，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指示信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有了新发展。但这封指示信还存在着许多“左”倾错误的观点和政策。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

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推动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和发展，抗联的建立是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结果，也是东北党组织对于抗日战争最伟大的功绩。但总的看，中央对东北抗战的领导缺乏针锋相对的战略部署。

（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对东北抗战造成不良影响

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不顾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像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议还着重反对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打击那些从实事求是出发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会后，中央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调离领导岗位；省委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之为“机会主义”。

（三）党中央没有从总体战略上高度重视东北的抗战，给予必要的具体指导和部署

1936年至1937年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兵力达3万余人，给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以莫大威胁。1936年杨靖宇曾精心组织两次西征，以达到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沟通与中央红军的联系，掀起抗日新高潮的战略企图。而当时的党中央在《八一宣言》发出之后，对东北的抗战却没有战略构想，没有从总体战略上高度重视东北的抗战，没有具体指导、部署东北的抗战，没有考虑抗联牵制敌后的巨大作用，没有主动派人赴东北联系，对于当时的党中央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战略疏忽。如果当时党